

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 参 考 資 料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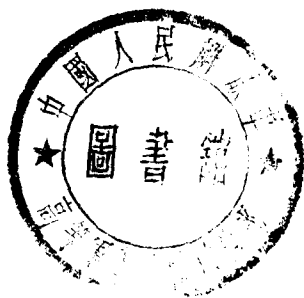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 参 考 資 料

[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編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1958年·北京

304007

編 者 的 話

为了供本校学习“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同学参考，我們从“解放”、“理論与现实”等报刊搜集一些論文，編成这本資料。其中有些文章是早年發表的，个别統計数字已陈旧，某些論点也不一定妥当，現在都保持原来面貌，不加訂正和注明。原刊中显然誤排的字句和标点，付印时作了某些改动，倘与作者原意有出入，由我們負責。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

1956年11月13日

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参考資料（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編輯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北京西便門大街西便門外大街28號）

*

1957年2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2次印刷

1668—Ⅲ·850×1168耗1/32·8³/₁₆ 印張·221,000字

2215—3223(1000+9)册

定价(6):0.80元

目 录

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陈伯达	1
論鴉片战争	胡 繩	14
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曲”	胡 繩	38
鴉片战争后的国民生計問題	千家駒	45
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間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軍閥 官僚势力的关系	邵循正	73
中国工业与中国資产階級	陈伯达	85
中国資本主义經濟發展中的若干特点	吳 江	110
旧中国工业的若干特点	陈 真	161
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	汪敬虞	178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	汪敬虞	188
現代中国的土地問題	陈翰笙	205
現代中国的农业經營問題	孙曉村	230
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場	薛暮桥	248
英美烟公司和豫中农民	明 潔	255

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近代中国经济杂说之一——

陈 伯 达

在东亚的大陆上，有一个国度，它的人口占全地球约四分之一，它的历史是世界文明开始的最早国度之一，这个国度就是中国。这个国度经历过数千年的长期封建社会。虽则这国度中各族人的足迹，如汉人的足迹在很早时候就曾经西至波斯湾，东至日本，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和锡兰岛，蒙古人的足迹且曾走得更远；但这个国度在大体上还是闭关自守的国度，这点是由它的长期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这长期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农村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天地，不论在农业上或手工业上，经营方法的特色是“祖传”和“秘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来，这在其他各国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有差不多同样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生产方式就这样说过了：“旧的生产方式的保守不变，曾经是一切过去产业阶级生存的第一个条件。生产的继续的革命，一切的社会关系的不断的动荡，永远的不安与运动，是有产者时代与以前一切时代不同的特色。”在那种旧的生产方式中，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分工，所谓“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左昭二十六年，齐晏子），祖孙父子世袭了一种同样的工作。

祖传与秘制既然是旧生产方法的特色，所以，社会上就流行了关于各种守旧的习惯，崇拜各种古董。人们养成一种食古不化意识：祖传的就是好的，非祖传的就是不好的。在各种的机遇上，对于各种东

西，人們总要自称是祖傳的正宗。各个独立生产者是以祖傳和秘制为光荣而傲人，并用来压倒对方的。多少“王麻子”的剪刀鋪，都自称是真正祖傳的“王麻子”，企圖取得自己是王麻子正宗的招牌。一直到現在，北平还有一个肉食鋪自称它的肉湯是从明朝傳下来的，因为这样“数百年祖傳”的肉湯，門市就特別兴盛。工農業品，職業，政治制度，社会規矩(礼教)，學問，宗教，甚至血統关系，人們都要自称是祖傳的正宗，以求得到社会的尊重。

近代中国不少資產階級学者饒舌不休地爭論：所謂“东方文明是靜的，西方文明是動的”。这种抽象的爭論当然会流于愚蠢的爭論。但是要如不落于愚蠢，而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比較說来，那末，也即可以那样說，因为东方本来处在封建生产方式的情况中，所以，其“文明”就表現是“靜”的；而西方則早已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發展，所以，其“文明”就表現是“動”的。

忽視中国旧封建社会的保守这一面，否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过“停滯状态”，这是忽視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具体的特点，也是否認了馬克思根据历史分析早已提出的观点。但是却不能由此得到一种奇怪的結論，說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絕對的不变与不动。誇大相对为絕對，这是荒謬的，这就会走到否認中国社会历史發展的規律性，把中国历史变成神秘的偶像，像一般頑固的国粹論者所做的。

自从春秋战国以后，社会分工已有某种一定程度的發展。有了“百工”的發展，便也会有交易的發展^①。固然，这是不可誇大的，而且也有倒退的时候(特別如大家公認的南北朝中的北朝)。由于手工業“百工”的發展，就出現了某种手工業的协作以至某种手工業的工場。而远在唐代，甚至已發現了某种机器的制造(如旧唐書李皋傳所載：

“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艦，挟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挂帆席。”宋史岳飞傳載：洞庭湖中的湖匪曾使用輪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飞”^②)。明时景德镇的瓷業，像当时一个法国傳道师曾这样描写过：

① 孟子：“以百工交易”。

② 轉引自錢亦石：“近代中国經濟史”。

“景德鎮者，周圍十方哩之大工業地也，人口近百萬，窯約三千，晝間白烟掩盖天空，夜則紅焰燒天”^①。清代工場手工業也有進一步發展。這些簡單的例子正表現了封建社會之一般必然的規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里面產生的，是在封建社會的腹內生長和成熟起來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不管其如何表現為停滯狀態的，然而總是一步一步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历史趨向接近。

成為幾千年來中國历史發展的動力的，是農民、城市貧民及手工業者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鬥爭。中國封建社會生產關係，在二千餘年中幾乎每二百年左右為一周期即形成一次全國性的農業大飢荒，而在這大飢荒的基礎上即點燃了一次全國性的大農民戰爭——農民革命，每當這時候，社會各階級都卷進于這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漩渦。每次農民戰爭雖則由於缺乏城市革命階級的領導而陷於失敗，然而其結果總是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迫得他們要做些讓步，使農民及其他獨立生產者得稍為“休養生息”，這就成為社會生產力更往前發展的一個出發點。中國旧時历史上所謂“一治一亂”，或如三國演義上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事實上就是反映了上述的規律的。清末維新派的历史家夏曾佑所著“中國古代史”曾說：“中國历史有一公例，大約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之后，隆盛約可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亂象，又醞釀數十年，遂之大亂，復成革命之局，漢唐宋明，其例一也。而其間偶有參差者，皆具特別之原因，無無故者……”。夏氏看出這規律的一定現象出來，當然是一種發現，然而他却不能具體把握這規律的本身。历来把農民革命看成“叛亂”，這本是統治者的偏見，可是農民對旧統治者的叛亂，也畢竟是最大的榮耀，沒有這種“叛亂”，是沒有中國历史上的光明的。

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按照它自己運動的規律，是可能在一定的日子“突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即使沒有西方人的影響，中國总有一天要由封建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是它還在走着駱駝式的

① 轉引自吳仁敬、章安潮：“中國陶瓷史”，51頁。

慢步时，西方人就赶到它的前面，中国就被抛落到后面了。在和十六七世纪以来的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人真落后了。中国还以“唯我独尊”的上国自居，然而西洋人大踏步地叩关而进，中国的腐败畢竟抵抗不住了，藩籬被拆毀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产工具底迅速的改善，由于交通工具底無窮的更加容易，就把一切人民，連那最野蛮的也在內，都卷进文明里面来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的重炮，它用这个轟倒一切中国的城牆，用这个克服野蛮人对于異族的最頑强的仇恨。它强迫一切民族在毀灭的威胁之下，不得不采用資產階級的生产方法；它强迫他們輸进所謂文明到他們里面去，就是說，变为資產階級的。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样子創造一个世界。”

否認中国封建社会的自己运动可能走到資本主义，这观点是錯誤的。同时，如否認近代中国的出現資本主义是歐風美雨波及的結果，这观点也是錯誤的。

自然，中国旧生产方法的抵抗仍然是有力量的。小農業与手工業的結合——这个在經濟上祖傳的家風，对于外来資本主义商品的抵抗，仍然会表现出其一定的作用来。馬克思在“对华貿易”一文中，曾引了英国人一些报告，来証明了这点。把这些材料在这里轉引出来，对于旧中国經濟的了解，是很有兴味的。关于中国人“宁願穿着父亲和祖父的古服”这事实，馬克思引了如下的一个报告：

“中国人的生活如此儉朴，如此守旧，以致他們穿着他們祖先穿过的衣服，就是說，他們所用的只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余概不需要……每个中国劳动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換新衣，而且这套衣服，虽做得極粗糙的工作也能經穿三年。因此，这种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們輸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兩倍；換句話說，这种材料要比我們可以运到中国去賺錢的最重的厚布还要重兩倍。”

穿父亲和祖先的衣服，或者一件衣服至少穿三年，或者一件衣服穿一輩子，这在上二三十岁的中国人中，也还是一件并不惊奇的事

情，而且一直到現在，在不少地方，也还是不足惊奇的。这种土布的坚牢，可以从其洗衣的方法看出来：中国旧时洗衣，都是叫做搗衣，而且是放在石头上搗的，虽則是这样，仍然沒有妨害他們的耐用，这种土布大部份本来就是农家自己家庭的产品。这里可再轉引馬克思所引过的那个英国人的报告：

“收获完結的时候，各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紡紗，織布；这种家庭制造的，重笨而結实的，能够經受兩三年內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国人就用来縫制自己的衣服，而把剩余的土布拿到近城去出卖，城市商販就購買这种剩余土布去供給城市居民及內河船夫的需要。……世界各国中，也許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都有一架織車，这是值得注意的。在其他各国，人們只限于梳理棉花和紡紗的工作，他們的生产过程到这里为止，他們把紡成的紗交給織匠去織成布匹。只有富裕的中国人，才一定要把一切手續做到底。中国人不仅要梳理棉花和紡成棉紗，而且还要自己的老婆和女兒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織成布匹；他的生产不仅只为自己家庭的需要，而且其一大部份的工作時間是用来生产一定量的布匹去供給鄰城和內河居民的。

例如福建的农民不仅是一个农民而已，他又是种田人，又是小手工業者，他生产布匹，簡直不費分文的（如果原料的价值不算在內），他在自己农庄屋子里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織成布匹；这种土布的織成不費特別的劳动，也不費特別的時間。在田苗未熟的时候，在收获完結之后，在天雨不能外出操作的时候，他就使农庄的工人紡紗織布。总之，一年当中只要有一些空閒的时候，这个家庭勤劳的模范人物便从事生产什么有益的东西。”

这种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妨碍了西方資本主义商品在中国的貿易，不过，这种抵抗是很有条件的。第一，机器大工業大生产之产物的特色，是大量而精巧；因为机器的生产是大量，所以是价廉的；因为机器的生产是精巧，所以是物美的。这种价廉物美的商品，終究不是小生产的农家副产物或手工工場的产物所能匹敌。第二，正由于中国在

經濟上是落后的，而建筑在这落后的經濟上面的政治及其軍隊是腐敗不堪的，这就不能阻止資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地用强力的方法去破坏中国旧經濟的基础。

繼續輸进大量的鴉片毒藥，以吸收中国民間的命脉——銀子；压迫中国政府支出大批的賠款，而使这种賠款經過賦稅的方式嫁在广大农民和手工業者身上，使大批民众的家庭破产；强迫或引誘中国农民为之生产農業原料品，使他們逐步离开自己手工業的副業……这一切就是在逐步地破坏中国旧經濟的基础，給資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拓市場，并使中国經濟逐步地变成它們的附屬性質。

在鴉片戰爭中，由英国暴力所造成的南京条約，中国割讓香港而外，又承認了五口通商，使資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深入內地通商的主要据点，而由这条約所演变的通商章程关于值百抽五的关税規定，且使中国失掉了关税自主的权利，使外国商品对中国經濟的优越压力，除了价廉物美方面之外，更有不平等条約这方面了。鴉片和棉織品的輸入，銀子和絲茶的輸出，这些仍占門戶开放后第一个时期中国国际貿易的主要地位。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闕在一八五九年代表上海外国洋行到內地收买絲茶，曾叙述了一段关于中外貿易的狀況：“凡外国运来貨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內地。又非独进口貨为然，中国絲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裝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間，商务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貨往来于南風嶺者，不下十万人……”^①这时离开第一次鴉片战争終結时（一八四〇——一八四二）有十七年的光景，湖南湘潭在当时还算是內地，而由这地方到广州的肩貨工人已达十万人，这說明了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确已展开了自己的市場了。誠如馬克思所說的，“資产階級社会的真正任务，就在創造世界市場——至少在大体上創造世界市場，并創造以世界市場为基础的生产。既然地球是圓的，那末，移民于加里佛尼亞和澳大利亞以及中日門戶开放，大概是完成了这个过

^① 容闕：“西学东渐記”。

程”^①。中国門戶确被打开了，中国确已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市場的部份。关于这点，恩格斯远在一八四七年就有以下一段深切的描写：

“因为机器日益减低了工業品的价格，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旧有手工工場制度或旧有工業制度，各处都被破坏了。一切半野蛮的国度，过去多少是离开了历史發展的，其工業向来是依靠于手工工場的，現在已迫不得已而走出閉关自守的狀況。这些国度已开始購買比較便宜的英国貨，而使手工工場中的本国工人一定归于灭亡。这样一来，像印度这样数十年来未曾有过什么成績的国度，就处处起了革命，而且甚至中国現在也在走近革命。事情已弄到这个田地，就是在今天英国發明的新机器，經過一年以后就会剝夺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飯碗。这样一来，大工業就把世界各民族联系了起来，把一切小規模的地方市場統一成了一个世界市場，使文明进步普及各地，并产生了一种結果，即在文明国中所發生的現象一定要影响到其余各国”^②。

中国已与世界联結起来，閉关自守的中国变成世界的中国了。用“祖傳”和“秘制”鳴高的各种陈腐不变的產業組織逐步地不能存在，一件衣服可以被穿一輩子甚至几世代的大部份家庭工業棉織品逐步地在被外国大工業的棉織品所代替。自給自足的村社的小天地是在逐步地破坏了。馬克思論印度的时候，对于这种“小規模的、半野蛮的、半文明的村社”的經濟基础的破坏，曾称为：“这样就实行了亞洲所未經過的一次最大的，而且可說是唯一的社会方面的革命”。这种革命，同时也就是对于暴虐的專制政体基础的破坏，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說的：“無論什么地方，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習俗还保全着的地方，这种習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橫暴的东方專制政体的基础”^③。在中国，这种經濟上的变化，同样的是一种革命，而这就是百年来中国經濟領域上的第一次革命。

① 馬克思：“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致恩格斯信”。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③ 恩格斯：“反杜林論”。

把中国重新閉关起来,这就如那一切反动派想复古一样,是不可能的了。重新閉关中国,这是反动的思想。然而,正因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一部份,中国在資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前面,就最需要民族的独立自主:这种民族的独立自主,是使中国由落后变成先进之重大的条件。中国不应做先进資本主义国家銷售商品以榨取額外利潤的簡單市場,不应做先进資本主义国家掠夺农产品及其他原料的农業国,一句話,不应做它們的殖民地。中国应有自己独立大工業的發展,而克服小生产的落后。自鴉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侵略的抵抗完全是正当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是如何热情地在欢迎中国人民这种英勇的革命斗争呀!

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是代表当时中国人民的斗争。太平天国在土地問題的共产主义烏托邦的旗下,却干着一种客观上合乎历史所需要的工作:在大江南北破坏了许多成为生产力發展的桎梏——地主的田庄。一方面,这革命給旧封建經濟制度以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这革命同时也是打击了資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侵略。在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〇年)后的第三年(一八五三年)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

“在中国革命最初的一个时期,我就要讀者注意一件事情,即中国革命大概將給大不列顛的社会經濟狀況以一个致命的影响。考察家杂志現在傳出这样的消息:‘中国人的起义正在产茶区域里扩大起来,結果倫敦市場上茶叶漲价,而在上海市場上洋布跌价’。……据最近經广州傳出来的消息說,‘起义逐漸普及全国。使商業有全部消灭的危險;結果,各种布匹几乎一律都跌了价,而且有几种布匹跌价跌得很厉害。存貨很多,并且迅速增加着……在厦門,进口貨的貿易(如果几箱鴉片不算在內的話),現時几乎沒有……’”^①。

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約后,英国对华輸出曾一度迅速增長,从一八四六年貿易額又下降下来,甚至整个情形是發生了这样的特点:“中国絲茶向英国的輸出額日益增長,而英国布匹对华的輸入額,整

^① 馬克思:“生活昂貴”。

个講来,却没有变化”^㊸。發生这样特殊現象的原因,除了中国旧經濟頑强的抵抗性以外,鴉片貿易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从一八四三年起,鴉片却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一八五六年輸入中国的鴉片,約值三千五百萬元,英、印政府在这一年內,在鴉片貿易上得到二千五百萬元的收入,即占國家收入總額的六分之一”^㊹。所以,使得当时一个美国商人就提出了这样的問題:“究竟那种貿易应被取消:鴉片貿易呢,还是英美商品的出口貿易呢”?或者如当时上海道台对一个外国人所說:“只要停止向我国輸入这样多的鴉片,我們就能購買你們的制造品”^㊺。虽則这样,可是,太平的革命运动以及南中国人民反对外人的不断斗争,終究是阻碍了資本主义国家在华市場的扩大,并且由于太平的禁止鴉片,同样地是会阻碍鴉片市場更进一步的扩大,明白这个原因,我們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英国人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那么不滿意太平运动,結果直接組織了武裝,帮助了清朝和曾李頑固派来打敗了它。中国有海关报告,是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开始的,按照那报告的統計表,在一八六四年,中国在貿易上还是出超(当然过去鴉片貿易的大漏卮,是沒有統計的),这年也正是太平天国失敗的一年,从次年起,就馬上轉到入超了。后来除开一八七二——一八七六这几年是出超的数目之外,一直被繼續增長的入超所支配。这說明了:正是太平失敗以后,資本主义国家已在中国巩固了自己的市場了。

容閔曾这样悲嘆过(这位先生曾做过香港的律師,又当过上海外国洋行購買絲茶的代理人,他初見曾國藩时,本来只要建議教育計劃,后来由其友人的授意,才建議設立机器厂的計劃):“……自有歐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輸入中国以来,中国工業乃大受其影响,生計事業,几已十夺其八九”。又說:“外洋机械輸入,后經国际战争及其通商立約等事,而中国劳动界情势,乃为之一变,此不仅扰乱中国工

㊸ 馬克思:“中英条約”,第一篇。

㊹ 馬克思:“鴉片貿易”,第二篇。

㊺ 以上均引自馬克思:“鴉片貿易”,第一篇。

業制度，且于將來全國之經濟實業政治上，皆有莫大影響也”^㉑。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劫掠者，陸續從海外走進中國，經營所謂“工商業”，另一方面，則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或則完全破產，或則以不能照舊生活，而被拋出農村，或到外國去，或到城市中來，成千成萬的直接生產者和生產工具脫離出來，“像鳥一樣自由的許許多多的無產者，就被投到勞動市場上來了”（馬克思）。剝奪直接生產者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也即是：“……一方面是轉變社會的生活資料與社會的生產工具為資本，另一方面是轉變實際生產者為工錢勞動者。所謂原始的積累，無非是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分離之歷史的過程”（馬克思）。在中國，這種過程，一方面成為國內資本家發展資本主義企業之原始積累的創造，另一方面又成為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企業（殖民地企業）之原始積累的創造。

革命是生產力的動力。雖則太平革命是失敗了，但畢竟打擊了封建經濟制度，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福州……茶商購入英國機械，設廠製造，大獲厚利，一時開辦三廠”^㉒。“上海之洪盛米號，創設於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為國內最古之機器碾米廠”^㉓。容闕於一八六三年替官僚曾國藩計劃創設上海江南製造局，成為新式工業的特出者。軍事工業的創辦，在事實上也不能不影響於其他工業的發展。“槍炮工業之製造，必用煤鐵，因而促進煤鐵工業，更進而促進多種工業”^㉔。一般說來，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機器工業在一些工業部門已初步的或多或少地有所發展。在個別部門中，外國在中國創辦的新式工業還有更早的（如道光年間的黃浦船塢）。

一方面，是一步一步地變成資本主義列強特權占有的市場，另一方面則一步一步地從舊經濟的破壞過程中生長出資本主義的因素，

㉑ “西學東漸記”。

㉒ “今世實業通志”，下冊，66頁。

㉓ 同上，22頁。

㉔ “上海之機制工業”，8頁。

这样，使中国的社会一方面走向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則走向半封建化。一八九四年（即甲午战争的年份），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話，事实上，正反映了中国这种变化的趋向的。

“对华战争給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不可能；铁道之敷設，蒸汽机和电气之使用以及大工业之创办，即为着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已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按插比較稠密的入口的那一切陈腐的社会制度，要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將無事可做，將不得不移往国外……”^㉑。

“曾用这种方法^㉒替英国商业所开辟并曾能引一时兴旺的最后一个新市場，就是中国。唯其如此，英国资本家才这样坚持主張要在中国建筑铁路，但在中国建筑铁路，这就是破坏中国小农业及家庭工业的全部基础，而且在中国，就是發展本国大工业，也絲毫不会在相当程度內弥补这种害处，因此，数万万民众將处于完全不能生活的状态”^㉓。

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中国的失敗，在中国经济上出現了一些新的情况。列宁說：“在欧洲，我們可以很确定地指出新资本主义完全替代旧资本主义的时间：这就是二十世紀之初”。同时，这种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是从十九世紀末开始的。列宁在論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壟断之發展的历史的过程有下一段：“十九世紀末的高漲时期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年的危机时期。那时卡德尔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了。资本主义乃变成帝国主义”^㉔。这个历史的划分，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有極大的意义。和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差不多同时，中国近代史，經過中日战争，才完全形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状态。而这点和帝国主义经济生

㉑ 恩格斯：“致赵尔格信”。

㉒ 指暴力方法而言——原譯者注。

㉓ 恩格斯：“致达尼爱松信”。

㉔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

活是密切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写的：“……我们是生存于世界殖民地政策的一个特殊时代之中，这种殖民地政策是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最新阶段’即财政资本，有异常密切的关系”^①。为什么呢？因为：“商品输出，是以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资本输出，则是以垄断占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要是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末，过剩的资本，就不用作提高国民生活标准，因为这样便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是要以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中去的方法，来提高利润的。在这些落后国家中，利润常常很高（因为资本很少），地价较低，工资低廉，原料又很便宜。资本输出之可能，是由于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铁道的主要路线已在建设或开始建设；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已有保障等等……”^②。因为“资本主义愈发达，当原料缺乏愈觉厉害，竞争和获取全世界的富源愈形紧急，于是为获取殖民地的斗争也愈趋于你死我活的现象”^③。因为：“在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上，财政资本有异常伟大的势力，或者可以说是有决定一切的势力，能屈服政治上完全享受独立的国家，并且在实际上已经屈服这些国家……但是，对于财政资本最‘方便的’最有利的属国，显然是这种失去政治独立性的附属国家和民族。在这一点上，半殖民地的国家，便是标本式的‘中间’形式。在世界已分割完结的财政资本时代，争夺这些半独立的斗争，当然是特别紧张”^④。因为：正如一个历史家的“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论“列强与瓜分世界”所指出的：“近年来地球上自由的土地，除中国以外，已被欧洲列强和北美合众国所占据了”^⑤。这样资本主义列强从十九世纪末年掠夺中国的斗争，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们集中注意力来从事瓜分中国了。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第六章。

② 同上书，第四章。

③ 同上书，第六章。

④ 同上。

⑤ 转引自同上书，第六章。

以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为契机，帝国主义者本来是要立即把中国完全瓜分的，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帝国主义間本身难以协调的矛盾，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可是，畢竟达到一种目的，就是把中国瓜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作为自己独占的市场，独占的原料地，独占的投资地。也即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各帝国主义统治（一方面是分别统治，另一方面又是共同统治）下的真正半殖民地。在各势力范围内，有自己的租界和租借地，并各自大举从事建筑铁路的投资竞争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馬关条约关于外国在中国开办工厂的允许，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办工厂，掠夺煤铁及其他矿业，成为一时的风气。由于他们获得的政治特权，资本的优越，加上原料的便利，劳动力的低廉，它们的企業，对于中国土著的企業便占了优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这种对于中国的资本输出，同时也引出了另一种结果，就是刺激了土著企业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的：

“资本输出所到的那些落后的国家，影响到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异常加强其发展。因此，倘若这种资本的輸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起輸出国发展上的相当的停滞，那末，它是以扩大和加紧全世界资本主义向前的发展为其代价的”^①。

一方面，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的把中国的经济变成它的附庸，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又不可免的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相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无情的掠夺中国农民和無产者，另一方面，却进一步把無产者集中起来，使他們和农民及一切人民联合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基本矛盾的特点。

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掠夺当成“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認賊作父，由此而否認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民粹主义者否認近百年中国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由此而对于中国革命动力作出了反动的結論。可是，现实的經濟状况，不但推翻了托洛茨基派的胡說，也推翻了中国民粹主义者的意見。

（选自“解放”杂志，1941年第一二八期）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第四章。